



# 隋唐长安佛教社会史

A Social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Sui-Tang Chang'an

季爱民 著

# 隋唐长安佛教社会史

A Social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Sui-Tang Chang'an

季爱民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长安佛教社会史/季爱民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1-11841-4

I. 隋… II. 季… III. 佛教史-宗教社会学-研究-西安市-隋唐时代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5225 号

---

书 名 隋唐长安佛教社会史  
著 者 季爱民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½ 插页 2 字数 36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841-4  
定 价 68.00 元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序

季爱民曾从我治隋唐史，今年撰就《隋唐长安佛教社会史》书稿，征序于我。不论从对“长安学”的关怀，还是论与爱民的友情，我都义不容辞，故此欣然命笔。

长安是隋唐帝国的中心，长安城更是公元7至9世纪东亚世界的一大都会。从佛教史的视角来看，长安是隋唐两朝最大的佛教社会之所在，是各种佛教人物活动、思想激荡、经济运作……的最大场域。这里聚集了当时最有学识的三藏法师、学僧、外来高僧，也有从各地、各国前来求法的僧徒，加上本地的徒众、沙弥、在家的信徒，他们展演着不同层级的佛教历史。长安大小寺院林林总总，从隋文帝到武则天，再到中晚唐的一些佞佛皇帝，自上而下的推力，使得长安城不断涌现新的寺院，部分皇帝的龙潜之地，还有一些贵族的豪宅，由于种种原因而演变为佛寺，大者占一坊之地，次之占半坊、四分之一坊的区域，因为长安城规模宏大，哪怕是占四分之一坊面积的寺院，也具有相当的规模。所以我曾论证从王府到寺院带给长安城的意义，它们占据了长安城的神圣空间，由于传统礼制的制约，周秦汉以来中国本土具有宗教意义的建筑，反而大多数都在都城之外，这就给佛教在长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长安的佛教教团或寺院，和皇室、贵族乃至平民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来自社会的供养，让佛寺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佛教则给予社会大众宗教的关怀和信仰的指导，这是长安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有些佛教徒参与政治活动，像武则天时期的怀义、德感，玄肃代诸帝时的不空和尚，都对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脱离了佛教社会，就不能完整地理解隋唐长安的历史；反之，脱离了长安社会，也不能弄清楚长安的佛教史。

然而，与长安的伟大、长安佛教的重要性相比，有关长安的研究、有关长安佛教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考虑到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学术生态，十多年前，我和一些老师、学生一起，开始了“长安读书班”，期望推动“长安学”的研究，这其中的一个主力成员，就是季爱民。

季爱民在学期间,刻苦钻研,常常在中心一坐就是一天,寒暑假也是如此,所以同学们昵称“季老”(本意是季羨林先生的尊称),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其他同学相比他年龄偏大,更重要的是他和中心北面朗润园 13 公寓的季先生一样,好学沉稳,持之以恒。爱民抱有以学术为生命的信念,积累了大量的研究心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隋、唐初的王府与寺院讲学》,博士论文则重点探讨北朝后期到唐前期以长安为中心的佛道关系问题。毕业以后,他更加专注于长安的佛教社会,水涨船高,学问日益精进。

本书是他近年研究的一项成果,重点探讨长安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从多重角度来讨论长安不同等级的寺院在经济、信仰、生活等方面与世俗社会交互关联的问题,展现给读者动态的长安佛教社会景象。目前,跨学科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过去隋唐史的学者不太关注佛教史的问题,而佛教史学界讨论更多的是佛教的义理、哲学、思想问题。爱民的新书正是这样一部综合研究隋唐佛教和社会的论著。我先睹为快,受益良多,欣喜之际,略述感慨,谨此为序。

荣新江

2015 年 12 月 17 日于朗润园

# 目 录

|                              |       |
|------------------------------|-------|
| 序 .....                      | 荣新江 1 |
| 导 论 .....                    | 1     |
| 第一章 寺院的社会等级与相互关系 .....       | 14    |
| 第一节 寺院的社会等级 .....            | 15    |
| 一、皇室建立的寺院 .....              | 15    |
| 二、贵族与民间供养的寺院 .....           | 17    |
| 第二节 寺院社会等级的维持与升降 .....       | 32    |
| 一、寺院社会等级的维持 .....            | 32    |
| 二、寺院社会等级的升降 .....            | 38    |
| 第三节 寺院之间的关系 .....            | 41    |
| 一、高僧在寺院之间的居止选择 .....         | 41    |
| 二、寺院之间的利益矛盾 .....            | 43    |
| 小 结 .....                    | 45    |
| 第二章 佛教宣传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       | 47    |
| 第一节 佛教宣传的新“旧”格局              |       |
| ——两种《盂兰盆经赞述》的撰写背景与影响 .....   | 47    |
| 一、玄奘师徒推动新译佛典世俗传播的努力 .....    | 50    |
| 二、新“旧”宣传方式的并列格局 .....        | 57    |
| 三、两种宣传方式的影响 .....            | 65    |
| 第二节 佛教宣传与社会的互动               |       |
| ——《金刚般若经灵验记》的编写与流传 .....     | 68    |
| 一、各种编集本之间的关系 .....           | 69    |
| 二、《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与初唐长安佛教信仰 .....  | 74    |
| 三、庾信入冥故事与初唐舆论宣传 .....        | 77    |
| 四、故事改编与 7 世纪下半叶佛教宣传新动向 ..... | 84    |

|                            |     |
|----------------------------|-----|
| 第三节 《陀罗尼集经》宣传与贵族供养 .....   | 87  |
| 一、两京地区密教传播的合法化 .....       | 87  |
| 二、慧日寺译经与贵族供养 .....         | 91  |
| 三、道教徒宣传密教新说 .....          | 96  |
| 小 结 .....                  | 101 |
| 第三章 唐前期国家寺院经营与政治秩序 .....   | 103 |
| 第一节 动态的国家寺院网络 .....        | 103 |
| 第二节 国家寺院集中区域的变化 .....      | 117 |
| 一、初唐安福门街两侧的国家寺观 .....      | 117 |
| 二、洛阳上东门街、定鼎门街两侧的国家寺观 ..... | 121 |
| 三、盛唐延喜门街两侧的国家寺观 .....      | 122 |
| 第三节 宗教宣传与儒家伦理 .....        | 123 |
| 一、佛教宣传与孝道伦理 .....          | 124 |
| 二、道教宣传与孝道伦理 .....          | 125 |
| 三、宗教宣传与国家宗教实践 .....        | 128 |
| 第四节 国家寺院与政治秩序 .....        | 132 |
| 一、南北朝至隋唐国家寺院名称的变化 .....    | 132 |
| 二、纪念性寺院与礼仪秩序 .....         | 136 |
| 三、国家寺院与政治秩序 .....          | 139 |
| 小 结 .....                  | 141 |
| 第四章 唐前期佛教信仰与家庭秩序 .....     | 143 |
| 第一节 贵族生活与佛教供养 .....        | 146 |
| 第二节 佛教信仰与士大夫的家庭秩序 .....    | 154 |
| 一、夫妇相处之道 .....             | 155 |
| 二、尊卑与长幼关系 .....            | 166 |
| 三、家庭内外之间的关系 .....          | 170 |
| 四、丧葬安排 .....               | 175 |
| 第三节 佛教供养与居民家庭生活 .....      | 179 |
| 第四节 佛教信仰牵动家庭秩序 .....       | 182 |
| 一、护持伦理关系 .....             | 182 |
| 二、牵离家庭秩序 .....             | 186 |



|                                 |     |
|---------------------------------|-----|
| 小 结 .....                       | 191 |
| 第五章 从边缘到中心:盛唐初期的都市社会与东山禅法 ..... | 193 |
| 第一节 东山法门北传 .....                | 194 |
| 第二节 士大夫宗教议论与东山禅法 .....          | 203 |
| 一、武后后期 .....                    | 203 |
| 二、中宗时期 .....                    | 209 |
| 三、睿宗至玄宗初期 .....                 | 216 |
| 第三节 居民信仰方式的新趋向 .....            | 222 |
| 第四节 东山禅法在佛教社会史中的地位 .....        | 239 |
| 第六章 唐中后期的权势阶层与僧团流动 .....        | 243 |
| 第一节 国家寺院与僧团流动 .....             | 243 |
| 一、供奉皇室的寺院 .....                 | 244 |
| 二、为国祈福的寺院 .....                 | 248 |
| 三、坊市宣传性寺院 .....                 | 251 |
| 第二节 新兴权贵的佛教经营 .....             | 255 |
| 第三节 权势阶层与僧人流动 .....             | 264 |
| 一、乘如进入长安 .....                  | 264 |
| 二、圆敬居住宝应寺 .....                 | 266 |
| 三、良贲徙居集州 .....                  | 267 |
| 小 结 .....                       | 270 |
| 第七章 会昌毁佛的社会反响 .....             | 272 |
| 第一节 功德使权力进退 .....               | 272 |
| 一、功德使逐渐丧失权力 .....               | 273 |
| 二、功德使恢复权力 .....                 | 275 |
| 第二节 寺院存毁与改名史事 .....             | 279 |
| 一、寺院存毁的记载 .....                 | 279 |
| 二、寺院损毁的程度 .....                 | 281 |
| 三、“依旧名额”与“改名旧额” .....           | 284 |
| 第三节 僧尼生活变动 .....                | 288 |
| 第四节 世俗社会的反应 .....               | 292 |
| 一、士大夫的态度 .....                  | 292 |

---

|                      |     |
|----------------------|-----|
| 二、宦官的佛教经营 .....      | 296 |
| 三、居民信仰方式的沿袭 .....    | 297 |
| 小 结 .....            | 299 |
| 结 论 信仰生活的秩序与理性 ..... | 301 |
| 参考文献 .....           | 306 |
| 后 记 .....            | 349 |

# 导 论

## 一、选题缘起

隋代(581—617)大兴城始建于开皇二年(582)六月,位于北周(557—581)长安东南的龙首原上。大兴城东西长 9721 米、南北长 8651.7 米,周长约 36.7 公里,面积 84 平方公里。郭城内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除了宫城、皇城与两市,将郭城分为 108 坊。坊墙之内,分布公私建筑和佛寺、道观<sup>①</sup>。韦述记载:“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sup>②</sup>寺院经营一开始就与社会紧密相连。唐代(618—907)长安,皇室成为寺院营建的主体。

不断营建的寺院吸引了地方与外国的僧人,僧团的聚集与流动加强了长安的佛教中心地位,也为城市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同一寺院可以容纳不同学业的僧侣,同一学派的僧团能够延伸到不同的寺院,寺院、僧侣以及僧团之间在佛教宣传上呈现多样化的共存与竞争格局。这种状态势必带来居民信仰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也使得佛教有可能渗入民众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

宗教社会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宗教与构成社会的其他社会单位之间有相互作用的关系<sup>③</sup>。从这一角度讨论长安佛教社会史能够深化隋唐史的研究。荣新江曾提示寺观研究的意义:“长安的佛寺道观既是名僧高道的修习讲学之地,也是皇家、贵族、官僚、百姓供养的对象,它们和世俗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长安各种宗教寺宇及其相关人物的研究,必将加深

---

①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 年 6 期,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 年,页 40—45。

② 《长安志》卷 10,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三秦出版社,2013 年,页 328。根据妹尾达彦的研究,《长安志》记载主要来自于韦述的《两京新记》(《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9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15)。

③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页 4。

我们对唐朝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社会史的认识。”<sup>①</sup>佛教与社会之间关联的领域和程度,经过深入观察才能作出评估,总体而言,目前的讨论还不充分。

与中古时期的其他都城如北魏(386—557)的平城(398—494)和洛阳(494—557)、东晋(316—420)、南朝(420—589)的建康以及北宋(960—1127)的东京、南宋(1127—1279)的临安相比较,长安作为隋唐二朝的都城延续的时间最长,同时期的东都洛阳延续的时间与之相当。虽然历经政治革命和短暂的社会动荡,但民众大部分时期生活在安定而繁荣的环境之中,同时,社会也发生渐渐的变化。例如,学界一般认为中唐已经开启了唐宋转变,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显著变化是贵族社会让渡于官僚社会<sup>②</sup>。作为知识人汇聚和流动的集中之地,都城地区也是观察中古时期佛教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理想区域。

长安与地域性城市以及东亚其他都市之间有密切的文化交流。西域敦煌等地的写本文献、佛教美术等已经有较为充分的分期研究,洛阳、扬州、成都、幽州等地形态各异的佛教史料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期的日本古代都城如藤原、平城和平安京的佛教社会史也因古文书的公开、考古发掘成果的公布而得到持续的关注。历时性地讨论长安佛教社会史,可为地域之间的宗教文化比较及互动关系的讨论提供参照。长安佛教社会史问题的讨论越具体、越细致,则具有的参照价值就越大。

长安史料的丰富性为具体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出土文献有的直接来自长安,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长安,如果与其他史料相互验证,就可以大致还原这些文献产生的历史场景。传世典籍涉及长安者尤为集中。初唐佛教史家法琳(572—640)、道宣(596—667)、道世(生卒年不详)主要居住在长安,他们关于周边人物、史事的记载内容翔实。盛唐史家韦述(?—757)有良好的家学渊源,他关于两京里坊、寺观和人物事迹的记载为探索唐人的精神世界提供直接资料。外典资料如《唐会要》、两

① 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唐研究》第9卷,收入《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90—193。

②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页10—18。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64—79;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19。

《唐书》、《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涉及长安史事者也很丰富。石刻铭文为隋唐史研究的重要资源,近年,西安、洛阳地区碑石不断出土并整理刊布,是都城佛教社会史研究新的资源。

无论从史料的发掘、社会学方法的应用还是论题的拓展上,都城佛教社会史研究都有充分的发展余地,长安的文化魅力不乏有待研究和揭示之处。

## 二、研究主题

宗教社会学主要讨论意义和秩序<sup>①</sup>。意义主要探寻针对个体与社会的关切所提供的解释。这种情况下,伦理、价值、动机、目的、意义、功能等有着类似的含义,都可以用来说明意义。解释中古时代人们宗教实践的动机是困难的工作,但也并非不可能之事,因为人们“本能地追求普适性和稳定性”,“对普适性的追求使得个体或群体的意义系统努力将所有日常的事件和经验整合到一种可以理解的范式之中”<sup>②</sup>,社会稳定则是宗教的基本功能。长安社会的佛教实践也基本如此,但意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远超过上述概括。

长安社会有着多元或混合的意义系统。从传统看,儒家思想有着长期的影响,儒家伦理规范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因而处于主导地位。大兴城建设之初兴建的寺院数量远远超过公私学校,社会各界对于寺院和僧团的供养历久不衰,从一个侧面说明佛教的意义系统具有深厚的影响。民众在社会生活中汲取多种宗教资源,这样的意义系统就很难贴上单一宗教的标签。以孝道论为例,三教都提倡孝道。印度佛教已有孝道论<sup>③</sup>。冉云华认为,佛教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原有的佛教伦理价值作出调整,“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超过在印度的传统……孝道与中国官僚政治的结合,是印度历史所没有的现象”<sup>④</sup>。可见,佛教方面汲取了传统

①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页8—9。

②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页72。

③ Gregory Schopen, "Filial Piety and the Monk in the Practice of Indian Buddhism: A Question of 'Sinicization',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TP 70, (1984), pp.110-126.

④ 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受容及后果》,傅伟勋主编《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页108。佛教孝道论贯通性的讨论,参见道端良秀《佛教と儒教倫理:中国佛教における孝の問題》,东京:平乐寺书店,1985年。

社会的价值因子。但也不能因此否认佛教的独特意义。经营寺院和举办佛教仪式,如果用儒家伦理解释,或以“佛表儒里”概括,显然过于简单,因此,需要详细讨论佛教在宗教实践中的社会意义。

佛教内部的意义系统也是并列、竞争和兴替关系。不同学派的僧团、学业相异的僧侣在宣传时风格不同,对于意义的看法有时也大相径庭。这就使得佛教与社会联系的方式、佛教供养的方式呈现不同的形态。不同学派有时提供相似的意义系统,但宣传方式却不同。对个性化的宣传方式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探索能够深化了解长安佛教的多元形态。

一段时期,社会上盛行一个学派,该学派或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资助,或风靡于民间<sup>①</sup>,但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盛唐时期流行于两京社会的东山法门(后来的北宗禅)。这一学派在武后末至睿宗时期政治混乱、佛教过度发展之际北传,给都城地区带来清新的佛教风尚,宗教信仰转趋理性。这一学派也是中唐儒家心性论的促动因素。这种意义系统的兴替关系也应得到关注。

秩序就是“社会共同体在运动和变化过程中,其内部的各个方面或者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相对平衡、稳定、和谐的发展状况”。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莫顿(Robert K. Merton)等人从多方面论证宗教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正面功能,莫顿还讨论宗教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sup>②</sup>。传统社会中,佛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推动力量。

佛教信仰对于皇室、官僚贵族、士大夫以及一般居民的家庭秩序的影响有无差异?这需要从供养方式、夫妇关系、尊卑长幼关系、家庭内外关系以及丧葬礼仪等方面分别观察。就皇室的家族秩序而言,唐前期的重要事

① 学界对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问题尚有争议。汤用彤晚年倾向于使用“学派”一词(《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汤用彤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367—416)。李四龙从佛学主张的成熟方面提出确认宗派的依据(《论“五重玄义”的解经体例》,“中古中国的信仰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页1—11)。蓝日昌认为佛教宗派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佛教宗派观念发展的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孙英刚注意到宗派视角的局限性(《夸大的历史图景:宗派模式与西方隋唐佛教史书写》,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页361—373)。

②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页20—22、83。

件莫过于武周代唐,武则天(624—705)利用佛教意义为即位称帝制造舆论<sup>①</sup>,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一事件是否是孤立的个案?它的社会影响如何?如果将关注点从政治领域转移到贵族与士大夫的家庭生活之中,会看到佛教影响社会生活更为丰富的细节,也才能对佛教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做出切实的评估。

佛教与唐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有着复杂的情形。所谓社会变迁,“指的是一个群体或社会的社会安排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对社会学特别有意义的社会变迁则指的是长时段里社会结构发生变更的过程或一系列过程”<sup>②</sup>。盛唐以降,政治与社会领域显著的变化是知识人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层的重要来源<sup>③</sup>。安史之乱后至局势逐渐稳定的德宗(742—805)、宪宗(778—820)时代,科举入仕的知识人仕途有顺畅与坎坷,官位有高低之别,他们与佛教的关系也各不相同。与唐前期的贵族供养方式比较,这些知识人在信仰方式上有无延续和变化?唐中后期的知识阶层信仰上有无差异?这都需要结合他们的生命史、个人际遇、学识修养等作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综合性判断。

宗教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史的共同点是对历史现象的阐释,因此,可以相互借鉴;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意义与秩序本身,后者则注重方式、过程和关系。佛教如何为宗教实践提供意义系统,以及佛教信仰与都城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长安佛教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侧重于“秩序”和“理性”两个主旨。理性就是“以越来越精确的抽象概念为手段,越来越能理论性地支配现实,或者,以越来越精确地计算合适的手段为基础,有条理地达成一个特定既有的现实目的”<sup>④</sup>。“秩序”体现宗教的基本社会意义,在中古时期涉及信仰、人伦规范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理性”体现中古佛教信仰方式的转变。旧的信仰传统带来政治和社会危机之际,新的信仰方式会激发传统思想中的理性因素,从而促使

①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页153—174。A.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Kyoto: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 2005.

②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页117。

③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4章《科举与社会等级再编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52—269;金滢坤《中晚唐至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④ 韦伯《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436。

社会秩序达到新的平衡。

### 三、资料与方法

长安历史文献较为丰富,根据来源和保存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四种,对于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具有各自的价值,也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概述如次。

一为传世史料,这是主要的资料来源。包括(1)《隋书》、两《唐书》等正史。其中《本纪》与传记部分是人物生平研究的主要资源。(2)典章制度。《隋书》卷27《百官志》,卷35《经籍志》,《旧唐书》卷43《职官志》,《唐会要》卷10《郊拜》,卷47至49《释教》、《道教》,《大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卷20《太府寺》,《通典》卷23《礼部尚书》、卷106《五礼篇目》,《唐大诏令集》中有关于释、道教的制度部分。(3)历史地理著述。主要用以建构关中地区以及长安及其周边寺院的空间格局。正史地理志中有地域文化的论述。韦述《两京新记》卷3残卷<sup>①</sup>、宋敏求《长安志》、骆天骧《类编长安志》<sup>②</sup>、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李健超增订)<sup>③</sup>、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sup>④</sup>、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sup>⑤</sup>是这方面的基本史料。(4)类书、文集。主要有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徐坚编《初学记》,李昉等编《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其中宋人编类书保留大量史料,可资校勘、引用者很多。六朝及唐人文集是了解作者思想的主要来源。(5)笔记小说。初唐承六朝志怪小说之风,有《冥报记》、《冥报拾遗》、《法华经传记》、《华严经传记》等小说,此后,张鷟《朝野僉载》、戴孚《广异记》、段成式《酉阳杂俎》有从世俗角度观察佛教活动的。(6)域外史乘。除了上述圆仁的著作之外,日本僧俗人士访问两京,相关传记可作补充材料<sup>⑥</sup>。

二是考古遗存、文物与金石铭文。包括(1)考古遗存、文物。这是佛教

① 《两京新记辑校》,辛德勇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② 《类编长安志》,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③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徐松撰,李健超增订,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④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圆仁原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

⑤ 《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⑥ 例如,《藤氏家传》记载藤原惠惠在慧日寺求学的经历,见竹内理三编《宁乐遗文》,东京堂出版,1962年,页880。



社会史研究的实物资料。考古遗存保留了现场,对于综合讨论有很高的价值。(2)金石铭文,是主要的实物遗存,集中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等处。《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陕西金石志》等有录文及考证资料,也包括实物不存,仅有录文者。《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文博》、《中原文物》、《华夏考古》、《碑林集刊》、《唐研究》、《唐史论丛》、《東アジア石刻研究》等刊物也有陆续公布。墓志资料主要有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sup>①</sup>、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sup>②</sup>、陈尚君《全唐文补编》<sup>③</sup>等。近年,墓志等铭文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成为研究的重要资源<sup>④</sup>。志文传递的宗教现场感较少,但保留了志主宗教体验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史料,志文作者有时也流露宗教体验和情感,这提供了实证性的经验材料。

三是敦煌吐鲁番遗物。长安与地方城市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敦煌和吐鲁番等地保存的唐代遗物,有来自长安的文书等遗物。(1)长安僧团的佛经注疏、讲经文,如果有不同僧人对同一佛经的注疏,可以结合其他史料,比较其异同,从而分析都城佛教宣传方式与相互关系。(2)敦煌的《金刚经灵验记》故事抄本最初源头是初唐长安流传的故事集,但中间经过改编。(3)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唐龙朔二年(66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和《唐神龙三年(707)正月西州高昌县开觉等寺手实》<sup>⑤</sup>,可以作为长安寺观经济状况的参照。(4)国家寺、观抄经。佛经抄写方面,隋文帝时代

①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唐代墓志的检索工具,参见气贺泽保规编《新版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增订版),汲古书院,2009年;陈尚君编《唐五代文作者索引》,中华书局,2010年。

②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1—9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于2006年出版。

③ 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

④ 主要有:赵君平编《邛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田晓利《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张乃翥《龙门区系石刻文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齐渊编《洛阳新见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郭茂育、赵水森编《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⑤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页52—53、60—61。参见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2期,页50—55。